



文化寻根丛书



孔令宏 著

从道家到道教



中华书局

“文化寻根”丛书

从道家到道教

孔令宏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道家到道教/孔令宏著. - 北京:中华书局, 2004
(文化寻根丛书)

ISBN 7-101-03970-7

I. 从… II. 孔… III. ①道家-哲学思想-研究
②道教-研究-中国 IV. ①B223.05②B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5964 号

责任编辑:陈 虎

“文化寻根”丛书

从道家到道教

孔令宏 著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市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13 1/4 印张 312 千字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32.00 元

ISBN 7-101-03970-7/K · 1642

序

癸未夏日，酷暑难耐，闻浙江大学孔令宏教授著《从道家到道教》成，中华书局即将出版，欣喜过望。中山大学哲学系李锦全教授和复旦大学哲学系潘富恩教授皆为学界耆宿，孔令宏教授先就学于李锦全老师取得博士学位，又师从潘富恩先生经过“博士后”深造，此书即为其求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孔令宏教授原来着力于宋明理学，近两年逐步转移到道家与道教的研究，不断有书信往还，与余切磋学术。其实，孔令宏教授的博士生导师李锦全教授，也是我早年在中山大学求学期间的师长。我于1982年离开中山大学，遂按钱学森教授的建议由自然科学改行研究道家与道教，先后受业于陈国符教授和王明教授，至今不觉20余年矣。先师王明研究员曾就学于胡适、陈寅恪、汤用彤诸前辈门下，陈国符教授则私淑王国维先生。王明老师

生前以为道家与道教的学术研究,尚有若干学科的“基本建设”须有人着手完成。其一为编辑一部有关道家与道教文化的大辞典,其二为著一部中国道家思想史的学术专著,其三为撰写中国道教哲学史的著作。待这些“基本建设”的学术工程展开之后,便可在在此基础上创立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学文化,将道家与道教的研究推向新境界。孔令宏教授的这一新作,盖亦同王明先生关于道教研究学科建设的设想隐然相合。由于孔令宏教授治学经历不同,因之与吾之学术研究路数有异,故余对于其著述的学术观点不敢轻作评判。平心而论,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崛起的一批研究道家与道教的青年学者当中,孔令宏教授颇具实力,我亦有心招他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做博士后研究或做访问学者。可惜因这里指标受限和浙大不肯提供经费,致使好事多磨。好在孔令宏教授能自强不息,可望日后终成大器。先师陈国符教授仙逝后,其哲嗣陈启新先生委托我处理《道藏源流考》修订再版事宜,亦须同中华书局打交道。因之孔令宏教授告知此书在中华书局出版并邀我作序,余欣然述其始末并略撰数语云。

忆昔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自 19 世纪末以来,面对欧风美雨,西学东渐之冲击,遂由盛转衰,进入一次新的文化重构时期。当时中国学人对待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略分三派。其一是自《天演论》等西方启蒙主义思潮传入中国,那些接受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的人们,以为要救亡图存,必须彻底革命,破旧立新,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必须砸烂旧世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自然是古老的神州旧物,便被此派的代表人物当作“反动、腐朽”的东西归入统统“打倒”之列,他们把欧美的各种“主义”奉若神明,甚至提出“扔掉旧典籍”,“不读中国书”,“废除中国字”的口号。其二是

“文化寻根”丛书

一批对儒家的封建伦理观念感情甚深的人物,认为中国数千年来家长制的官僚专制政治乃是最适合中华民族国情的政体,欧美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政体不合中国国情,因之尧、舜、周公、孔子、孟子、朱熹一脉道统的“内法外儒”文化才是中国所不可缺者。他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既然“内法外儒,儒法互补”的文化为《二十四史》上历代帝王用以安定社会人心的工具,这些熟读《二十四史》的统治者又喜专权而怕民主,盼安定而恨动乱,故对儒家“亲亲尚恩”强化社会等级差别的社会伦理型政治文化心领神会。其三是近百年来,一批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整理和研究,这批人大都不是什么“政治家”或“革命家”,而是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近世清华大学的王国维教授和陈寅恪教授,就是这批学者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学术贡献彪炳史册。直至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中国学术界尚群星闪烁,他们培养的学生也大多有扎实的朴学根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圣脉并没断绝。然而在这段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宗教学研究却相对薄弱。陈寅恪先生曾云:“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而宋代史家之著述,于宗教往往疏略,此不独由于意执之偏蔽,亦其知见之狭隘有以致之。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学识更不逮宋。故严格言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中国儒生治史本来就忽视宗教,佛教史之研究尚且缺失,道教的史料更被视为“一堆精神垃圾”矣。幸有刘师培、刘鉴泉、沈曾植、许地山、傅勤家、陈垣、陈寅恪、汤用彤、王明、陈国符、蒙文通、王维诚、陈樱宁等学者,自晚清至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不断有论文和学术著作发表和出版,对道教的学术研究有开创之功。

纵观我国自清末以来一个多世纪中华传统文明的发展动向，人们发现原来那些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徒，虽然极力主张彻底挖断中华文明的根基，膜拜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其实他们对西方文明一知半解，骨子里仍脱不开孔孟之道的中国古老思维方式。相反，像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熊十力等真正学贯中西的文化巨匠乃至李约瑟等杰出的西方学者，却从未轻言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事实恰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云：“两极相通。”那些死抱着孔孟之道不放的遗老遗少，以及与之站在对立面扬言要“挖孔子祖坟”的人物，原来都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引向绝路的一丘之貉。因之，中华民族近百余年来在西方文化侵略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遭受的是一种自阉式的摧残。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学术研究又受到一连串政治运动的冲击。20世纪60年代，仅就中国哲学研究领域而论，学者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诸如老子、孔子的阶级成分是没落奴隶主阶级还是新兴地主阶级；老子的“道”与孔子的“仁”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再就是《太平经》与张角、张鲁、孙恩等农民起义的联系，更为当时学者所热衷。直至“文化大革命”，学术界大搞“评法批儒”等各类“大批判”运动，忙着给古人贴“政治标签”，学风败坏可想而知。等到在这种政治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学者担任了某些学术单位的负责人或博士生导师，更酿成一些压制人才、弄虚作假、粗制滥造、自我炒作等种种学术腐败现象。我国在历史上凡是社会人才选拔机制偏离公平原则之时，都伴随有学术腐败现象发生。史书上有“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三国志·董昭传》）的话，便是描述的这类社会现象。所幸我国自结束十年浩劫

之后拨乱反正,一批颇具学术功底的老一辈学者开始带研究生,在20世纪80年代又为国家培养出新一代学人,绍继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学术传统。现在真正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已经开始,我们不仅要认真学习西方文明的精华,还要将古老的中国文明介绍到西方,青年学者的文化使命是任重而道远的。近10年来我国老一辈学者虽然日见凋谢,但“江山代有才人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仍呈兴旺之势。

中国文化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重构。第一次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大约历时550年,奠定了以儒法文化为表层结构,道墨文化为深层结构的文化格局,出现了大一统的秦汉王朝。第二次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近400年间融汇多民族异质文化并接引佛教入中国,形成了儒、道、释三教分立而互补的文化格局,出现了开放、强盛的隋唐王朝,中国成了世界上东方文明的中心。此后儒学的统治地位不断加强,至宋明间三教为儒学所融汇,从而不断僵化并衰落下去。中国文化的第三次重构起于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大约在本世纪可以完成。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出现“综合创新”的趋势,新儒学的传播已初具规模,新道学文化的创立也势在必行。时代呼唤新一代学者承担起创新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重任,在21世纪完成中国文化的重构。孔令宏教授显然是属于21世纪的青年学者,他的大著问世可谓适逢其会。我盼望有更多的青年学者涌现出来,也期待着在新道学文化的研究领域有更创新的著作问世。

胡孚琛

识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2003年8月12日

目 录

第一章 汉代和三国——众术并竞与道教的产生·····	1
第一节 巫术、方术与道家的产生和发展·····	2
第二节 秦汉社会思潮的演变与道教的产生·····	23
第三节 《太平经》——以度世为本的道术体系·····	44
第四节 《周易参同契》的思想·····	112
第五节 五斗米道的道术思想·····	121
第六节 汉代与三国时期道教的总体特点·····	135
第二章 两晋南北朝——援道入术的道教(上)·····	139
第一节 魏晋玄学与道教·····	140
第二节 葛洪的道术体系·····	202
第三节 三皇派与灵宝派的道术思想·····	239
第四节 上清派的道术思想·····	250
第三章 两晋南北朝——援道入术的道教(中)·····	260
第一节 寇谦之对天师道的政治改革·····	260
第二节 陆修静对上清、灵宝派道术的糅合·····	268

第三节	陶弘景对道术发展的贡献	281
第四节	楼观派的援道入术	307
第五节	《升玄内教经》的思想	324
第四章	两晋南北朝——援道入术的道教(下)	333
第一节	道书编纂体例所反映的道教义理思想	333
第二节	南北朝时期道教对道家的吸收与融合	343
第三节	南北朝时期道教的义理统合	367
第四节	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总体特点	414
结 语:	道家与道教的关系新解	424
后 记		429

第一章 汉代和三国—— 众术并竞与道教的生产

道家源于巫术和方术，它的发展也与方术有紧密的联系。汉代道家在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前，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是直接的，此后则位处民间而有间接影响，从东汉中期开始又逐渐转为直接，进而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引致道教的兴起，又是引致东汉灭亡的原因之一。由此也引致道教遭受统治者的镇压和发生顺应统治者而争取生存权力的变革。虽然道教在产生时已经吸收了一些儒家的思想内容，如伦理规范等，但它与儒家显然有较大的差异，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对它仍然是加以排斥的。在正统的儒家看来，《太平经》之类的道教经书“多巫覡杂语”，“妖妄不经，不合明听”。不过，它们也具有存世的价值。这正如历史学家范晔所说，道教诸术“能仰瞻俯

“文化寻根”丛书

察,参诸人事,祸福吉凶既应,引之教义亦明。此盖道术所以有补于时,后人所当取鉴者也。然而其弊好巫,故君子不以专心焉”^①。

第一节 巫术、方术与道家的产生和发展

道教是“道”与“术”的结合体。从历史发生的事实来看,道与术二者之间,是先有术后有道。道是从术中概括出来的。对道的探索与表述,道家先于道教从事了这一工作。

一 巫术、方术与道家的产生

最早的术是巫术。在原始社会,曾经在一段时间内,每个人都可以自己行使巫术,后来才出现了专职的巫,到了阶级出现,氏族内部发生分化,巫于是开始与政治权力相结合。古籍中所谓的“绝地天通”,实际上是政治力量对巫权力的垄断。夏、商、周三代文化以巫术为核心。周王朝建立后,崇尚礼制,盛倡“敬天保民”,使得天帝信仰趋于人格化,巫、祝等神职人员的地位因之下降。平王东迁之后,诸侯割据称雄,大国争霸不断,社会动荡,繁重的人事压力迫使统治者不可能如从前一样专意于鬼神之事,使得巫祝、巫卜等神职阶层向两个方向发生分化:

一是仍然保留巫职,在朝野活动

保留巫职,在朝野活动的巫,随着文明的开化,从春秋晚期开始,其中的一部分衍变为方士,如周灵王时的苌弘、扁鹊等,进而在燕、齐、秦、汉即已流行多种多样的方术。它把巫术转化为既有行

^① 《后汉书·襄楷传》。

为,也有思想的操作系统,并增加了由观察、归纳、试验等步骤构成的效果分析、检验程序。但方术只是侧重于发展与自然界以及与生命直接相关的方面,而把社会历史领域所需要关心的人伦政治问题交给了由史官文化发展起来的道、儒、墨、法、兵等学派^①。由巫术而方术,是一个理性化、知识化的过程。经过理性化、知识化的洗礼,术的合理性、有效性更强了,而且有了更加细致的分工,包括对自然、社会和个体的人。方士主要是在朝廷任职。方士之外的另一部分巫,即在民间担任巫师之职的,从夏、商、周三代到秦、汉仍然广泛存在。这类民间巫师不像官巫那么地位显赫,但影响却广泛得多,而且由于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对于民众精神生活的影响、支配力度要比官巫大得多,《山海经》中就记载了许多有名的巫师。汉代应劭的《风俗通义》、王充的《论衡》中都谈到,当时的民间巫术,种类十分繁多,其功能涉及辟邪鬼、御凶灾、测祸福等方面,几乎涉及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各个领域。汉代以后,历代都有各种类型的巫术书籍,如《日书》、《梦书》、《占卜》等出现,但像《山海经》这样的综合性巫书在汉代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说明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巫被人们重视的程度逐渐降低了。

巫术是原始社会的人们用以消除外在世界与人之间的隔阂和对立的操作系统之一。它建立在具有鲜明泛灵论色彩的原始信仰之上,通过特定的语言和动作以及二者结合的形式系统表达人们的意愿,希图让自然、神灵的意志符合人们的需要。它没有神话那样简洁明快的诗意逻辑,而是诉诸繁复的仪式。它不像宗教那样

^① 其中,道家与术关系,本来就比其他学派密切,但它与术发生紧密联系是从稷下道家开始,并在汉代产生的道教那里表现得比较突出。

诉诸特定的终极关怀的精神价值,而是直接诉诸有限的实用性操作,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占卜。这就是说,它包括了超越性的观念与实用性的技术两个有紧密联系的方面。前者是对未知世界的想像性把握,一方面,它虽不是客观真理和行之有效的科学认识,却为获取科学知识提供了先行的观念引导;另一方面,它为人们突破困境现状指出了想像中的目标,增强了人们的自信心。就此而言,巫对人的行为合乎神性的论证与对神的力量的调遣,关系到人的实践及与此相关的自我意识。巫术当然不可能改善技术操作,却使人渡过了精神危机,为后继的技术改进提供了自我意识前提。因此,巫术在其信仰狂迷性消失后,这种超越性观念就转化为形上学,即哲学的本体论部分,这可由本为卜筮之书的《周易》转变为哲学之书的事实得到印证。正如康德所说,永远超前、不可知性认识的本体,为有限现象界经验的不断扩展提供了认识论的导引焦点;而作为积极价值的“本体”,不仅可以强化作为统觉之源的自我意识,而且提供了实践动力。后者是因生产技术的局限和困境而产生的。这种由想像引导的实用性操作是否应验,关系到巫师的切身利益甚至于生死,这迫使巫师不得不深入研究与生产有关的一切规律性现象并用文字记录下来,突破一人一事的时空范围而把观察经验加以整理、分析、综合、抽象。诚如弗雷泽所说,巫术是科学的近亲,其中对规律的客观有效的研究成为前科学,而那些脱离客观规律的臆想部分则仍停留于巫术^①。此外,“巫术对人的巨大强制力量,以及人在参与巫术时对禁忌的高度自律遵循,在此后除

① 弗雷泽:《金枝》中译本,第76—77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转化为宗教外,同时也给伦理道德留下了重要的遗产。而卜辞文字记录的传统则衍生为历史学”^①。综合这两个方面来看,巫术在观念上必然要被更为精致的宗教信仰和理性化的哲理即道所取代,在实用方面必然要被注重实效、范围更广泛的方术和再后来的科学技术所取代^②,而道与方术的结合,就是日后的道教^③。由此就不难理解道教能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现象了。

一是向史官方向发展

巫是古代最初的知识分子群体^④,当文字没有出现之前,他们掌握着神话和祭祀、交通鬼神的种种知识,是沟通人类现实与超越性的神的中介使者。进入文明时代后,他们参与着王朝的重大决策,而且将有关档案整理保管,即是最初之“史”。周代的内史、外史、太史都是由巫职中分离出来的,所以在《周礼·春官》中,它的职位与巫、卜并列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被视为“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的“君人南面之术”^⑤ 的原因。巫与史的分化开始于商代,但那时二者还没有明显的界限,史官仍

① 尤西林:《巫:人文知识分子的原型及其衍变》,《文史哲》1996年第4期。

② 由于文明开化有地域、民族的不平衡性,这一进程各地、各民族有先后。我国有的地方、民族甚至到了近代还有巫术存在。

③ 《隋书·经籍志》谈及道教经籍时说:“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

④ 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说:“巫术自自古以来便在专家底手里,人类第一个专业乃是术士底专业。”(李安宅译,《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第76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⑤ 《汉书·艺文志》。

具有宗教职能,在人与天、神、鬼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成书于商周之际的《易经》就是当时的宗教、巫术的反映,是由卜筮之官和兼掌卜筮之事的史官采辑、订正、增补、编纂而成的,成书后的《周易》一般亦由史官收藏和管理。由于社会文明的迅速发展,随着与巫、祝的不断分离,史官逐渐形成具有共同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思维方式和心理素质的职业群体。春秋时期,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区域一样步入轴心时代,理性文化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以理性为本的史官文化逐渐压倒以非理性为本的巫卜文化,但史与巫仍然有很多相类、相通之处。《老子》、《庄子》等所展现出的老子形象,多有与大巫相像之处。老子深谙相术,擅长从人的外貌推测其内心世界,而相术则是巫史的专长。《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庞朴对此解释道:“史官出于谁?正是那些能事无形的以舞降神的巫。我们读《左传》、《国语》,看到那些太史、内史、外史、蔡史、祝史、瞽史,多是一些料事如神而又博学多闻的人,他们‘知天道’、‘能相人’、工于卜筮、预见吉凶。”^①史官的主要职责一是司天,负责观测天象,依据日月星辰的变化规律来制定历法等,即明天道,这是一个主要依据理性来完成的工作。在这种理性精神的指引下,到了西周末年,以史官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开始怀疑和批判神秘主义的上帝、鬼神观念,对传统天道观进行改造,先民后神、自然为本成为史官的共识,进而形成了天道自然的思想,老子就是这种倾向的典型代表。他把天人关系中的天还原为自然之天,并在对它做高度概括的基础上从中演绎出带有普遍性法则

^① 庞朴:《稷莠集——中国文化与哲学论集》,第28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的范畴——道。

“道”是什么？就是道教围绕着“道”这一范畴铺衍推扩开来的有别于经验描述的理论解释。这是道教的首创吗？当然不是。道家思想才是其真正的渊源。就道家与道教的关系而言，从上述可知，道家是自巫术向方术转化时的另外一个发展方向中的支派。道家用以描述道的性质的哲学概念“无”，具有巫术的背景，实际上是从“巫”演化而来的。李泽厚指出，道家学派的奠基著作《老子》“仍然保存了好些非常难解和神秘的章段”，其中

闪烁出的正是神秘的巫术礼仪的原始面貌。只有这样，也才好了解这些语言和描绘。从而，被今人释为“本体实在”亦即《老子》一书中最为重要的观念“道”——“无”，其真实根源仍在巫术礼仪。“无”，即巫也，舞也。它是在原始巫舞中出现的神明。在巫舞中，神明降临，视之不见，听之无声，却功效自呈。它模糊而实在，涵盖一切而又并无地位；似物而非物，似神而非神，可以感受而不可言说；从而，“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也正是从这里，领悟而概括出“无”，并扩及“当其无，有车之用”，“当其无，有室之用”等等日常生活的哲理和智慧，并与权术、战略相衔接以服务于现实生活。^①

庞朴也说：

“无”字被选定为道家的哲学范畴，有其深远的思想渊源。在甲骨文中，无字是一个舞蹈者形象……无和舞本是一个字……舞蹈是事奉神灵的一种动作，而神灵……看不到摸不着

① 李泽厚：《己卯五说》，第66—67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版。